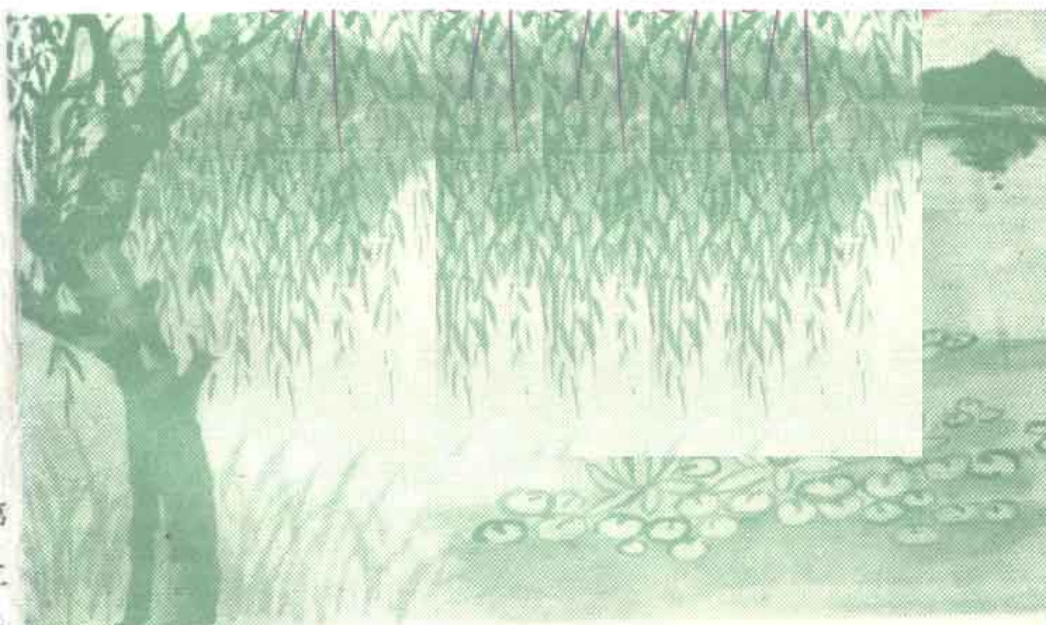


5

洱源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
洱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洱源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洱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一年元月

ZAS 101

主 编 苏仕代

副主编 [杨位儒

王靖宇

编 辑 李佩玖

杨圭臬

杨学胜

段本善

工作人员 王文新

杨道明

王宪洲

李勇峰

宋红芬

张寿堂



杨友棠将军像 杨继雄 供稿



施滉和罗静宜结婚照 施行生 供稿

目 录

洱源“两面政权”和甘霖对滇西北人民游击战争的贡献

.....周 涛 (1)

悼念甘霖同志.....云南省政协 (23)

一九四九年邓川政局记略.....杜文灿 (25)

上下江游击队

——滇西北第一支游击武装.....杨再春 (34)

施滉烈士生平

——访问罗静宜同志记录..... (49)

挺立在松辽平原的苍山青松

——施介烈士传略.....县党史办 (61)

到蒋管区购买武器的经过.....顾思义 (83)

严瑞昌烈士永生.....赵怀珍 (87)

攻打马老六的回忆.....顾思义 (91)

洱源革命先烈之墓碑序..... (97)

辛亥革命先辈杨友棠先生事略.....杨继雄 (99)

杨柿平先生墓道碑记.....杨子厚供稿 (103)

廖云阶先生传略

.....杨介人、杨光炜供稿 杨学胜整理 (105)

抗日胜利南昌受降纪实.....王绍琨 (117)

洱源“两面政权”和甘彝对滇 西北人民游击战争的贡献

周 涛

甘彝同志与我们永别至今快四年了，这位诚实严谨的忠厚长者的音容笑貌，时时记忆犹新。近日，甘彝夫人司瑞莲同志以甘彝遗诗四首见示，其中作于他因患癌症住院已三年多，病情日益恶化，距其逝世五个月的1985年7月4日，失眠偶成《述怀》二首云：

其一：暴政侵袭赤县颠，
群雄尽着救亡鞭，
同将马列作灯塔，
逐北追奔斗志坚。

其二：我追先行着鞭晚，
坚信吾人功必成，
待看神州“四化”日，
海峡两岸齐欢腾。

八行诗句，这位绝症缠身、行将就木的古稀老人的忧国忧民之心、献身祖国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之志跃然纸上。回想起这位老人对党的事业曾经作过的贡献，想到他以

后所受到的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进一步看到他在逆境中，甚至临死还有这样的情怀，更引起了我对他的崇敬和缅怀。

甘霖同志字雨苍，1910年3月9日生于云南省盐丰（今属大姚）县，1926年冬至1928年在云南陆地测量学校和道路工程学校读书，其间，接受了先烈王德三、赵祚传等云南地下党创建人的影响，参加了受党组织委派回云南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早期党员、革命先烈王复生筹建的国民党左派（时称“法政派”）测量学校区分部，被选为宣传干事，在参与革命活动和在省立师范夜校受训中直接受到王德三等革命前辈的教益。1928年考取南京市政府土地测量员，加入了国民党，1934年回云南在财政厅清丈处和公路管理局工作。这两个单位，在旧社会都是国民党事业单位中的“肥缺”，但甘霖同志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为，自愿在清丈人员养成所及其所办的保山、顺宁（今凤庆）等测量人员训练班任教，凭技术和教书谋生。薪水不足维持生活，则以到中学任教补之。1940年进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华理化讲习班学习，1946年被国民党盐丰县议会公推为云南省参议员。

甘霖进入省议会之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改组云南省政府之后，蒋介石力图加紧控制云南，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一些代表人物需要靠蒋保己之际。云南人民革命运动中的民主进步势力，则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实力派中的顽固分子的一致压抑，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在作为国民党云南地方政府的御用机关的省议会中，存在着开明进步势力与国民党顽固分子之间的尖锐斗争。甘霖以旧交友好的关系与打入

云南省参议会的中共地下党员杨青田（兰春）、唐锡畴（用九）、马曜（幼初）来往密切，深受他们的影响，在当时的形势下觉悟到“经济上清白自守、全在自己，政治上却不能自鸣清高，是非必须有以取舍”。从而积极支持杨青田等同志，参加组织了《云南地方自治促进会》，创办了《新云南周刊》，投入了反对国民党CC分子反革命活动的斗争，从中进一步受到中共地下党的教育，逐步明白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思想上产生了献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热切愿望。

1948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仍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正处于与国民党军进行前所未有的战略大决战的前夕。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滇东南、滇南人民游击战争方兴未艾。7月，昆明学生响应南京、上海师生开展的“反美扶日”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云南地方政府的大规模镇压。值此农村人民武装斗争亟需进一步加强领导和深入广泛发动、昆明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广大师生、进步人士亟需疏散之际，云南省工委决定加速滇西地区人民武装斗争的发动工作，与滇东南、滇东北相呼应，加速建立滇西、滇西北游击根据地。

洱源地处滇西北门户，又是鹤庆、丽江、剑川等县地下工作有所开展的滇西北重镇的屏障。中共云南省工委对洱源的情况，虽然有了调查了解，但没有开展组织工作，亟待开展工作。经马曜同志向中共云南省工委建议和推荐，保举甘霖出任国民党洱源县长，以掩护发展当地的革命工作。省工委同意了马曜的意见。1948年7月下旬，经马曜通过民主人士、国民党云南省民政厅主任秘书吴少默向厅长杨文清推荐，委任甘霖为国民党洱源县长。被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

都通缉的地下党员万国祥（化名万云光）疏散去洱源，以办学为掩护，负责党的地下工作，并由马曜、万国祥向甘舜介绍了革命青年张从曾任县政府秘书长，协助甘舜搞县政府行政工作，范如椿至洱源县中任教，协助万国祥搞学校工作。

当时，从本质和总体上讲，国民党反动派必然会失败、灭亡，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一定会胜利。但是，就革命胜利时间的迟早，革命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却非人们所能逆料。甘舜同志欣然接受了马曜的推荐和托咐，把爱人司瑞莲和两个儿子留在昆明，其中一个儿子年幼，还有一个儿子出生才两个月。利用他与国民党警务处长李毓楨“连襟”的姻亲关系，请李毓楨从警务处派了一部卡车，吴少默为他要了杨文清的名帖，于1948年8月23日携带着年近十岁的长女甘志芳，掩护着万国祥等人离昆，通过国民党军警重重关卡的盘查，8月底到达洱源县上任。在担任县长期间，与留在昆明的夫人不通书信，又无经济接济，他全心全力投入利用合法的县长职务作掩护，支持地下革命斗争。

二

洱源县在解放前，是一个仅有8万人口的“丙等”县，下设10个乡镇、50多个保。南面的凤起、云鹤、清源和西面的上江、下江五个乡属恶霸马锐（马老六、白族）的势力范围；东面（时称宁东、即县城所傍的古宁湖以东）的永宁、永乐两乡属清朝进士吕咸熙（紫光）的三公子、袍哥头目吕幼阶控制；城北以辛亥护国元老李识韩（白族、李佩荆）的影响最大；城区（五门镇）、城南（宁南）为云南省政府改组，龙云下台后退役回乡的滇西护路副指挥官张彦（张

子英)横行;县城西面的大松甸、鸡登村等一带山区,为招安匪首罗三庚(彝族)活动之区。甘霖的前任县长汪锡彬(鹤庆人),是一个昏庸贪财的老吏,地方军、政、治安大权为县警察局长徐恩铭、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段通(白族、剑川人)所左右。在这一群国民党贪官污吏推行的“三征”政策和地头蛇的重压盘剥下,全县地方糜烂,文教毁败,中下层人民不聊其生,大规模的人民群众反抗苛政的斗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但是革命者要在这地霸官匪、军警宪特紧相勾结的局面下,深入下层组织发动群众却并不容易。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的“通过上层、发动下层”,在洱源各种“天王”“诸侯”林立的地方是适用的。但究竟“通过”谁、怎样“通过”,问题却是复杂的,稍有不慎,出了纰漏,更容易坏事。直接派人深入下层工作,也可以组织发动群众,但是需要时日,适应不了迅速发动武装斗争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甘霖出任洱源县长,则有力地帮助地下党解决了开辟洱源工作的这两大难题。

甘霖根据马曜和万国祥的建议,以“保境安民”、“振兴教育”为理由,由他兼任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常备中队中队长,县立中学校长三职。万国祥任县中校务主任,担任县中的实际领导工作。范如椿为训导主任,管教学业务。物色了河北省落籍在洱源的国民党退役军官、马老六的把兄弟王献英,经万国祥直接教育后,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进入县自卫大队工作,控制部队武装。同时,经马曜推荐,万国祥教育考察后,发展了进步知识青年赵怀珍(白族,包大邑人)入党,并担任了县教育局局长职务,在万国祥的直接领导下,掌握全县教育阵地。在甘霖亲自领衔主持,万国祥的掌握领导下,洱源地方武装摆脱了地方各派势力的影响,为地

下党控制和改造这支武装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地下党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各派反动势力提供了依托。

在教育战线上，万国祥、范如椿进入县中以后，迅速团结了一批青年进步教师和宁湖小学里的一些小学教员。张从曾到县中代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段通担任的“公民”课教员，排除了县党部对学校的监视和控制。在万国祥等大批进步教师身体力行，认真整顿校风、校纪的推动下，不到一个学期，洱源县中、宁湖小学面貌大变，师生风纪一新，并在两个学校里发展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甘霖同志也以在地方上罕见的不带家眷，不拜会地方权绅，不分头召见绅士，不接受胥吏“接风”“洗尘”的清廉形象震慑了土豪劣绅，在各阶层人民中形成了良好的印象。

1948年10月，地下党滇西工委与万国祥取得联系，建立了以万国祥为书记，赵怀珍、王献英为委员的洱源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洱源县的第一个组织。在甘霖的掩护下，开展了党的地下组织活动。

三

1949年1月，省工委把在昆阳简师工作的地下党员周涛（白族、洱源人）、杨化（白族、大理人）调回洱源工作。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向我交待任务时，谈到了洱源当时的工作情况，以及甘霖同志和地下党的关系，要我回洱源家乡后，好好利用自己在家乡的有利条件和甘霖同志掩护工作的大好条件，和外地的同志搞好团结，一道把任务完成好。当时，国民党军警在昆明通往各县的各个关卡盘查甚严，郑伯克问我是否有办法通过，我向郑伯克汇报了云大历史系教

师、省参议员马曜，是我的外祖父和父亲交往甚密的乡亲，每年寒假他都要回家乡探亲、过年，可以与他同行。郑伯克说：“那你回洱源路上的事，组织上就不管了，你就去找马曜给你想办法”。我和杨化在马曜同志掩护下到达大理，桥，与滇西工委书记黄平相遇并接上了关系，黄平叫我回到洱源与万国祥联系，共同考察干部，建立县委，开展工作。杨化被留在大理工作。我随马曜顺利到达洱源。眼见宁湖小学这所我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母校，其活跃的民主空气今非昔比，洱源县中这所在我小学毕业后根本不屑一顾的心目中的“烂学校”已焕然一新，大大鼓舞了我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信心。但对甘霖同志，基于我自幼在家乡目睹的几任县官的恶劣印象，对之是颇有几分戒心的。为了工作方便，经万国祥同志与甘霖商议，把我安排作县督学兼县中历史教员，在公开的行政职务上，成了县政府的“属员”，有机会在县教育行政会上和县中“总理纪念周”上，听过甘霖的几次讲话，其言訥訥，但朴实可听，与我听到过的另外一些县太爷的“讲话”迥然不同，印象虽有改变，但并没有改变我和县里其他地下党负责同志，把他看作在本质上和其他旧县长没有多少差别的“国民党旧官僚”的错误判断。

1949年2月，马曜、万国祥根据省工委的布置，对甘霖进一步做了工作，甘霖向党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并请马曜、万国祥为入党介绍人。3月经滇西工委批准，洱源县委正式成立，以万国祥为书记，我和董子健为委员。县委讨论了甘霖同志的入党问题，通过吸收甘霖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按其旧官僚出身，候补期定为五年。显然，这是一个按中共“七大”党章规定办理的，是合法的，但按甘霖同志的历史实际却并不合理的决定。万国祥同志向甘霖转达了县委

的决定，他却十分高兴的接受了，并兴奋地表示：“一切交给党，什么都听党的。孰料就是因为这个决议，竟使甘霖同志获得了一个“统战党员”的谥号，而中共地下党洱源县委，也难免受到“靠统战党员起家”之讥。洱源县革命历史上的这一现象，其实际情况是什么，实质上是个什么问题，历史将为甘霖，也为当时的县委正名。

四

我们当时在洱源进行地下工作，准备发动武装斗争，思想上并没有、上级也没有明确给我们建立“两面政权”的指示。“两面政权”这个概念或名词，历史上我们并没有用过，我们所知道的和在秘密积蓄革命力量的实践中，所作的只是一件很简单但也是很难办到的事，即把甘霖吸收入党后，使他更明确、直接地接受地下党交给的任务，以他在国民党政权中取得的地位，去进行地下党需要他进行的工作。当时，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于向长江以南进军，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正在顽抗，政治上正在进行种种阴谋，在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地下党要派党员去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开辟地下工作，尤其是在一块小地方上担任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灭门的知县”，要做好党交给的工作，不是具备各方面的条件即无法办到。而这种进入国民党政权中的秘密党员，如果他没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操守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也根本无法执行地下党的秘密使命。像甘霖这样一位已经取得国民党给予的禄位的官员，如果他没有舍弃国民党给予的禄位，没有舍弃优裕的生活，没有毁家纾难的决心，他是走不了这条革命道

路的。但是，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来，对地下革命斗争最艰苦和最需要他的时候，自觉自愿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献身于革命斗争的人，却被视为“脚踩两支船”，介绍他入党的同志，批准他入党的洱源县委，被斥之是站在共产党，国民党之间搞“双保险”。但历史既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少女”，也不是可以任人歪曲的怪物。历史毕竟是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前，它将是现其本来历史面目的。

1949年春节以后的二、三月份，滇西北地区革命风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洱源县虽然是弹丸之地，但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地位却十分重要。谁掌握了洱源，谁即控制了滇西北的门户。因此，中共滇西工委要求我们加快工作步伐，配合支援罗德特区和剑川、鹤庆、丽江等我党地下工作的先进地区的行动，以争取在即将出现的大动乱中，地下党掌握斗争形势的主动权。但直到1949年2月，洱源地下党员只有万国祥、周涛、甘霖、赵怀珍、王献英（后判逃）5人、“民青”成员10多人，农村群众工作则还未全面展开。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完成滇西工委交给我们的任务，需要大批外来干部到洱源工作，同时又需要对全县国民党军、政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外来的同志及时到位，及时开展工作，迅速把全县武装掌握在地下党的手里，听候滇西工委的指挥使用。在完成这两项工作中，甘霖同志坚决执行县委的决定，完成了县委布置给他的工作任务，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形势需要，起到了别人所无法代替的特殊作用。

中共云南省工委、滇西工委在当年的二、三月，从昆明“七、一五”被捕出狱及参加峨山、易门、宾川等地武装暴动的地下党员、“民青”成员中，抽调了骨干董子健（化名李

文荣)、李德玉(女、化名李兴华)、钱平(女、)、肖鉴明(化名丁振纲)、曹炳(化名曹式蕃)、王振鹏(王扩宙)等人,从剑川、祥云调来党员、“民青”成员6人,从罗勐特区调来支援洱源工作的党员骨干18人,从外地转移回洱源家乡的“民青”成员、革命知识青年李丽康等9人,自愿到洱源投奔革命的外地革命青年余汝学等3人,共计有47人,均通过甘霖将上述骨干安排在国民党洱源县军、政机关或学校工作。属罗勐特区领导的上江、下江两个乡,滇西工委也通过甘霖安排去大批干部,并以洱源县委的委令指派工作。当时洱源县城住户不足500户,全县共辖10个乡镇,属洱源县地下县委领导的仅8个乡镇。在国民党政府叫嚣强化治安,行文通缉从昆明“流窜”乡下的青年学生的情况下,洱源县城突然增加这么多的陌生面孔,引起了国民党洱源县党部、县警察局的注视,并向甘霖发出警号,要他严予考察。审慎录用。甘霖毅然顶住了国民党警特的威胁和干扰,按县委布置和安排的名单、职务,把这些同志一一“委任”到位,在全县军、政、学各部门开展了工作,到4月底以前,地下党组织才得以掌握了全县的武装和各级政权组织。这是尔后能在一两天内,县委一声号召,即胜利发动了全县武装起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期,以国民党洱源县委的合法手段作掩护,地下县委在农村放手发展了农抗会,开展了反“三征”斗争。在此基础上,由甘霖以合法身分向省政府请求免粮、税。拖延、拒绝上解课银,并以“地方不稳”为由,向国民党省政府、大理师管区请求拨配枪支弹药,整顿、扩编县“常备队”和“民众自卫大队”。甘霖在马曜的帮助支持下,先后从省政府、师管区请领和购买到七九步枪60支、子弹15万发。

经师管区同意，将县常备队扩编至150人，并进行了整顿。中共洱源县委就此将常备队中的一些不纯分子遣散，以地下党员、农抗会员代之，由此掌握了武装力量，使尔后的洱源武装起义得以顺利进行，并在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初建时，为人民自卫军解决了弹药奇缺问题。

洱源地下党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全县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更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县警察局的疑惧。但由于甘霖是省民政厅长杨文清保举的县长，又是省警务处长李毓祯的连襟兄弟，县党部书记段通、警察局长徐恩铭在惊恐之余，他们没有怀疑、也不敢怀疑甘霖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他们所想到的自然是我们这些突然回乡和外地突然涌到洱源“谋职”的陌生青年学生。段通一再在县政会上要甘霖驱逐这些回乡的和外来的青年，徐恩铭一再要动手镇压群众革命活动。甘霖按县委的意见，对段通、徐恩铭的主张，以“安定为上”加以拒绝，进而以“段通的主张违背上峰旨意”，把段通赶出县政会，并令其“不得干预行政”，由地下党派人把他监视起来。对徐恩铭，则以“人事不和，有碍地方安定”为名，报请省警务处并亲自写信给李毓祯将其调职，警察局由甘霖兼理，实际由地下党五门区委所掌握。至此，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县党部及党棍段通，无法有所作为，被洱源人民称之为“小屠户”的徐恩铭去职，更是大快人心，土豪劣绅亦为之震动，但对甘霖，他们既慑于他的“铁面无私”，又怕他的“后台硬”，不敢轻举妄动。这又为县委在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基础上，开展统战工作，孤立打击死心塌地的顽固地霸，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解放前，洱源的上层社会，是个池浅王八多的场所。一个人口不足八万的县分，豪绅却到处结伙成帮，且在“上